

“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价值探究*

闫 慧

摘 要 本文研究问题包括：多种数字化贫困现象如何在现实社会个体身上组合起来，社会网络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雪中送炭，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锦上添花。论文深入挖掘中国六个省市乡村田野研究搜集的117位数字化贫困者和47位非数字化贫困者的个案数据，客观评估其数字化贫困特征值，精确描述所涉个案的数字化贫困程度及类型；发现强关系和弱关系与现实中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后的个体的数字化求助行为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赤贫者的数字化贫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越多，他们获得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程度越小；个体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越少，他们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强关系对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数字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和徒劳无益者有价值；弱关系则仅对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有价值。图1。表3。参考文献20。

关键词 数字化贫困 社会网络 社群信息学

分类号 G252.0

Fuel in the Snowy Weather or Icing on the Cake? Explor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Value in Alleviation of Digital Poverty

YAN Hui

ABSTRACT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How do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al poverty combine in real social individuals? What kind of concrete function forms does the social network have for reducing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digital poverty in the practice? For whom among the digital poor is the social network as fuel in the snowy weather? And for whom is the social network as icing on the cake?

By employ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paper digs deeply into the case data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teen digital poor individuals and forty-seven non-digital poor persons collected from rural field research in six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I assess their eight values of digital poverty, including digital material entities,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psychology, digital capabilities, digital efforts, digital social support, digital social norms and digital social impacts, and describe the degrees and types of digital

* 本刊“青年学术论坛”特约稿(Special contribution for the Youth Academic Forum sponsored by this Journal)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群信息学视角的数字化扶贫社会实验研究”(编号:17XNB015)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Experiment of Dig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Informatics” (NO. 17XNB015) funded by Research Funding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通信作者:闫慧, Email: hyanpku@ruc.edu.cn, ORCID: 0000-0002-3649-1601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YAN Hui, Email: hyanpku@ruc.edu.cn, ORCID: 0000-0002-3649-1601)

poverty in the cases involved. It is also purposive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networks, especially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and digital help-seeking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digital poverty types in reality.

The study argues that social network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he digital poverty degree of the digitally extremely poor.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compounding of digitalized poverty faced by individuals, that is, the more types of digitalized poverty are superimposed on individuals, the less effective support they get from social networks. The smaller the degree of digital composite poverty faced by individuals, that is, the less the digital poverty types overlap,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obtain effective social network support. Digital poor individuals with superimposition of poor conditions in digital psychology (i.e. the vulnerable poor) and digital capabilities (i.e. the digital illiterate), who are not materially poor, have significant reliance on strong tie in social network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Digital poor individuals based on insufficient digital social support, single or dual in poverty,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strong and weak ti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double digital poor on the basis of inadequate digital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orms to win the support of strong or weak ties. Strong tie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eradicating poverty among those who are at least vain seekers. Weak 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only in dig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the socially lonely, and no effect on other types of digital poverty. 1 fig. 3 tabs. 20 refs.

KEY WORDS

Digital poverty.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informatics.

0 引言

据 2017 年 8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 54.3%,互联网人口达到 7.51 亿^[1],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增长率变化幅度仅为 1.1%^[1],接近历史最低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互联网人口红利在近些年已逐步消失,天花板效应已然出现在互联网技术制约下的各行各业。面对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互联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信息职业的从业人员更应该优先关注社会公平现象,尤其是数字化贫困问题。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2],不仅与传统的贫困现象交织在一起,而且提升了贫困与信息问题的复杂度,是信息职业与扶贫工作者共同面对的新现象和新挑战。

基于笔者的前期研究,数字化贫困的核心

要素被描述为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规范、数字化社会支持和数字化影响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田野研究数据,识别出数字化贫困人群:物质匮乏者、数字化文盲、脆弱的贫困者、孤独的贫困者、懒惰的贫困者、抵触的贫困者、徒劳无益者以及数字化赤贫者等^[3]。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贫困现象如何在现实社会个体身上综合地表现出来?社会网络在数字化扶贫实践中对于消减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贫困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形式?社会网络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能够起到雪中送炭的价值?对哪些数字化贫困者来说是锦上添花式的影响?

社会因素在数字不平等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受到关注,特别是数字化贫困现象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如社会位置^[4]、感情支持和鼓励^[5-6]、社会网络^[7-8]、技术帮助^[9]、共同体验^[10]、社会机构环境^[11-13]、社会资本^[14-15]等因素的作用是明显的。在社区环境

下,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存在着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内部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强关系(Strong Ties)可以帮助社区组织更加广泛地使用ICT^[16]。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Weak Ties)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也很突出,比如在湘西北兴起的“微善风”民间助学慈善组织^[17]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推动下,充分利用弱关系,将分散在网络民间的慈善资源与贫困学生对接起来,以便实现更好效果的扶贫。目前,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数字化贫困者主动脱贫行为过程的影响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

1 研究方法

综合马克·格兰诺维特^[18]、林南^[19]、安德里亚·卡瓦纳夫^[20]对社会网络的观点,本文界定的强关系是指在同质性较强、经常见面的社群中可以相互获得支持和帮助的节点间的连接,常用来相互提供精神层面的社会支持,如家

庭成员、亲戚、好友、同事;弱关系是指连接若干个异质性较强的社群之间的节点关系,可以相互提供新信息、工具性的支持,如一个位于社群之外、但与本社群某个节点有连接的节点,如本研究中提到的村庄之外的乡镇电脑维修店店主或店员。

本研究采用的个案数据从笔者开展的六省市田野研究^[3]中收集。根据代表性和数据完整性,挑选了其中的164个一对一深度访谈样本,其中安徽19位村民、天津35位村民、重庆34位市民和村民、湖南16位市民和村民、贵州12位市民和村民、甘肃48名村民。

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文本编码方式分别提取相关文字表述片段并精确测量上述个案样本的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支持、数字化社会规范和数字化社会影响。另从访谈文本中提取出有关受访个体样本在主动寻求摆脱数字化贫困行为的文本片段,分别对社会网络关系类型、寻求帮助的数字化主题等进行编码。编码框架与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文本编码框架及量化标准

编号	变量名	编码范围	量化标准
1	数字化物质实体	台式电脑、笔记本、手机、影响数字化的身体健康状况	电脑≤40;分手机≤40分;身体状况≤20分
2	数字化服务	家庭网络、手机流量	家庭≤80分;手机流量≤20分
3	数字化心理	态度、兴趣、偏好、信心、情绪、意愿、感觉	负面/消极≤50分;积极/正面≥50分
4	数字化能力	具体操作技能丰富度、虚拟活动类型丰富度、熟练程度	丰富度≤60分;熟练度≤40分
5	数字化努力	时间长短、投入精力多少、习惯	时间≤60分;精力+习惯≤40分
6	数字化社会支持	亲朋好友拥有、使用ICT状况及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拥有、使用ICT状况≤70分;施助可能性≤30分
7	数字化社会规范	从年龄、性别、地域、时间段、象征性等方面判断社会对ICT的非明文约定	50分起,不利于个体的规范每项扣10分,有利的规范每项加10分
8	数字化社会影响	ICT对个人生活或工作产生的实际影响事例	提到1项有价值的活动,即60分,每增加1项加10分
9	强关系	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事	不量化
10	弱关系	ICT维修点服务人员、本村(社区)之外不常联系的人	不量化

依上述编码框架和量化标准,逐个对所选样本进行八个数字化贫困变量的量化。之后根据八个变量的取值分别赋予特定的类型标签:数字化物质实体取值和数字化服务取值均为0的个体,界定为物质贫困者;数字化心理取值为0的个体被定义成脆弱的贫困者;数字化能力取值为0的个体被赋予数字化文盲的标签;数字

化努力取值为0的个体被认定为懒惰的贫困者;数字化社会支持取值为0的个体被认定为孤独的贫困者;数字化社会规范取值为0的个体被界定为抵触的贫困者;数字化社会影响取值为0的个体被界定为徒劳无益者;八个变量全部取值为0的个体被定义为数字化赤贫者。表2汇总了各类单独的数字化贫困者的数量。

表2 各类单独数字化贫困者的出现频次汇总

类别	物质	脆弱	文盲	懒惰	孤独	抵触	徒劳	赤贫
频次	27	38	71	58	39	36	70	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田野研究所选地点及深度访谈个案均采用方便抽样,加上质性研究方法强调概念或变量的类别而非某一类的绝对数量,汇总的数量不具有代表性和可推广性,仅用于帮助读者理解每种数字化贫困人群的情况。表2明确表达的含义是,八种典型的数字化贫困类别在现实中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客观性。根据汇总的数据,除上述八种数字化贫困类型独立组成或叠加组成后的117位受访个案为数字化贫困人群外,其他个案(即所有八个变量均为非零值)为47位,可构成对照以分析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对不同数字化水平的人群尤其是数字化贫困人群的影响。

2 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贫困的整体作用考察

笔者根据表2数字化贫困典型类别叠加后的情况,汇总了在所选个案中出现的复合数字化贫困个体。集七种数字化贫困现象于一身的个案(横轴取值为7),即数字化赤贫者在样本中最少,表现出单独数字化贫困特征(横轴取值为1)的样本个案出现最多。这种多与少之间没有绝对的顺序意义,而是从某个角度启示我们这些不同类别的数字化贫困特征的多种可能组合方式。除数字化赤贫外的七种数字化贫困类别叠加而成的数字化贫困者类型如下所列(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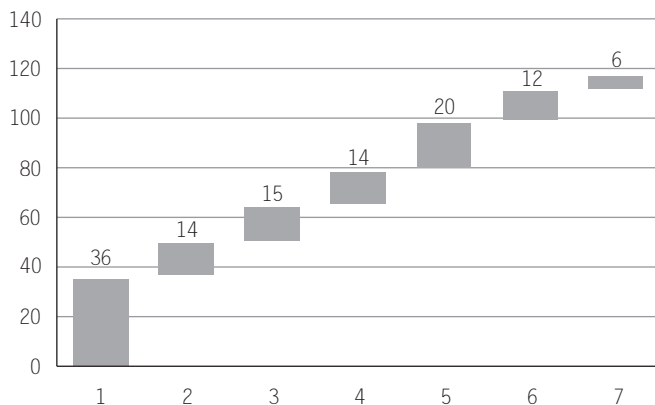


图1 复合不同数量的数字化贫困类型的个案总体情况

通过深入整理叠加后的数字化贫困者的类型,得到表3中所列的所有在样本个案中存在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类别。

(1)研究发现一:社会网络对消减数字化赤贫者的数字化贫困程度没有明显影响。

在本研究中涉及的6位数字化赤贫个案中,5位来自甘肃天祝县,1位来自湖南。他们

在访谈和其他形式的交流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数字化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6个个案均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社会网络为其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事例。从侧面证明分析,在消减数字化赤贫的任务中,这些人群所处的社会网络具有高度同质性,“要没有都没有,要贫困都贫困”的状况发生几率高。

表3 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类别汇总

叠加数量	数字化贫困特征叠加结果
7	数字化赤贫者(6人)
6	物质+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不抵触的近数字化赤贫者(5人) 物质+脆弱+文盲+孤独+徒劳+抵触=不懒惰的近数字化赤贫者(1人) 物质+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抵触=不脆弱的近数字化赤贫者(2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抵触=有物质的近数字化赤贫者(4人)
5	物质+脆弱+文盲+懒惰+徒劳=不抵触、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3人) 物质+文盲+懒惰+孤独+徒劳=不脆弱、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8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有物质、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4人) 脆弱+文盲+懒惰+抵触+徒劳=有物质、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懒惰+抵触+孤独+徒劳=有物质、不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4人)
4	物质+文盲+孤独+徒劳=不脆弱、不懒惰、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脆弱+文盲+懒惰+孤独=有物质、不抵触、不徒劳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脆弱+文盲+懒惰+徒劳=有物质、不孤独、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5人) 脆弱+文盲+抵触+徒劳=有物质、不懒惰、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懒惰+抵触+孤独=有物质、不脆弱、有影响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懒惰+孤独+徒劳=有物质、不脆弱、不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3人) 文盲+孤独+抵触+徒劳=有物质、不脆弱、不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2人)
3	物质贫乏+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脆弱+文盲+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3人) 脆弱+文盲+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2人) 文盲+懒惰+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懒惰+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4人) 文盲+孤独+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孤独+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2人) 文盲+抵触+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2	脆弱+文盲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者(1人) 文盲+徒劳无益的数字化贫困者(2人)、懒惰+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3人) 孤独+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4人)、孤独+徒劳的数字化贫困者(3人)
1	脆弱的贫困者(1人)、数字化文盲(1人)、孤独的贫困者(20人) 抵触的贫困者(8人)、徒劳的贫困者(6人)

这6个受访个案的基本特点是都位于少数民族地区或相对偏远的乡村,女性一般是家庭妇女,一般不参与社交活动,外出活动也很少,如甘肃天祝SM村的石姓中年妇女(注:为保护隐私,隐去真实姓名,下同)是土家族,家庭主妇;SM村的曾姓妇女也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湖南LY镇的杨姓奶奶年纪78岁,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主妇。或者远离其熟悉的出生地核心社会网络,在外打工,如甘肃天祝DT村的哈姓村民在安哥拉建筑工地做电焊工,SM村在新疆打工十五年以上的杨姓妇女,KL村的吴姓男子长期在新疆打工。他们对社交网络的低参与度或者疏离现象也能合理地解释其为何处于数字化赤贫状态。

(2)研究发现二:数字化贫困程度越高,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别在个体身上叠加的越多,数字化贫困者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本文所涉及的个案中,数字化贫困程度与数字化贫困类型的叠加数量多少成正比,即数字化贫困类型叠加数量越多,其数字化贫困程度越高,消减数字化贫困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是此部分讨论的逻辑出发点。

通过对数字化贫困类别在个体身上的叠加情况与个体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在数字化行为上的帮助的交叉分析发现,数字化贫困类别叠加的越多,贫困者主动寻求社会网络支持的频次就越低。

在七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数字化赤贫者)和六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中,即表3中前两类18位个案,没有出现一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帮助其消减数字化贫困的事例,这些个案在甘肃天祝出现最多,11例,湖南里耶镇3例,天津2例,安徽和重庆各1例。

在五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20位个案中,出现6例主动向社会网络寻求数字化帮助的个案,其中5例寻求帮助的社交网络类型为强关系,所涉及的场景分别是:手机使用遇到问题时求助孩子和媳妇(安徽JS村的王姓男居民),求助儿子帮忙打电话(天津HFX村的苑姓女居

民),手机问题求助儿子与丈夫(天津HFX村的田姓女居民),视频聊天时寻求邻居女儿(即网吧网管)帮助(湖南LY镇的杨姓年轻女性),让孙子查找冠心病药物信息(贵州贵阳的QY镇女性老年居民)。另外1例为弱关系,他在手机坏了时曾找过卖家帮忙。通过强关系,他们获得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社会支持、数字化社会影响在特定情境下的提升。

在四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14位个案中,出现5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的强关系帮助其完成数字化行为的个案,出现比率略高于上述两种情况。这5例的情境分别是:让孩子教自己使用第一部手机(安徽MF村金姓男居民);让孙子教自己使用手机(安徽MF村汪姓男居民);让儿子教自己使用手机(天津HFX村的李姓妇女);请好朋友同村装修店老板帮自己第一次使用电脑听歌、玩游戏(天津TH村的周姓男青年);请老同学帮忙申请QQ号(贵州贵阳QY镇的余姓男居民)。他们分别通过其强关系消减了当时情境下数字化能力的缺失程度。

在三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15位个案中,有6例主动寻求强关系的帮助消减特定情境下的贫困状态,分别是:女儿教父亲使用电脑(重庆YP镇中年男性居民);邻居帮忙实现与外地孙女的视频聊天(安徽MF村王姓老年男性居民);优先找亲戚解决手机使用中的问题(安徽MF村陈姓男居民);丈夫帮助使用手机(天津HFX村的王姓中年妇女);亲戚提供可供上网的电脑和场所(甘肃CKY村马姓中年男子兼百货店店主、KL村师姓男居民)。强关系帮助他们消减了特定情境下的数字化物质贫困、数字化社会支持贫困、数字化能力和努力的缺失。

在两类复合数字化贫困的14位个案中,有7例主动寻求社会网络帮助的个案,其中6例寻求强关系的帮助,情境包括:老教师请办公室的青年教师同事帮忙打印总结材料(天津HFX村的于姓男教师);结婚时娘家陪嫁电脑(天津TH村的王姓女性居民);电脑中毒时邻居帮忙把360杀毒软件改成金山毒霸并成功杀毒的经历

(天津 TH 村的马姓男性居民);孙子帮忙通过百度查找灭杀葡萄虫害的成功事例(甘肃 CKY 村韩姓葡萄大棚经营者);丈夫帮忙实现与女儿的 QQ 视频聊天(湖南 LY 镇的吴姓女性居民);儿子帮忙查找医药信息(湖南 LY 镇的女性中年居民)。另外 1 例寻求弱关系的帮助,情境是甘肃 KL 村的唐姓学生与笔者在田野研究认识之后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过几次寻求专业帮助。强关系在这组数字化贫困组合情境中消减了物质贫困、能力缺失、社会影响不够、社会支持不足等方面的贫困程度。

在单独类别的数字化贫困的 36 个案中,有 20 个受访者提供成功寻求社会网络帮助消减数字化贫困状况的事例,其中 12 例通过强关系,8 例通过弱关系。他们通过强关系解决的问题有:邻居小孩帮忙解决手机发信息不畅通(安徽 MF 村陈姓男居民);长辈(爸爸、表叔、大伯、婶婶)提供学龄期青少年第一次玩游戏、听视频、看电视剧的电脑和空间(天津 TH 村的王姓男孩、王姓女孩、李姓男孩、林姓男孩和朱姓男孩);朋友商店提供可使用的电脑(甘肃 HD 村的闫姓男居民);九岁儿子去同学家用电脑(重庆 YP 镇工厂中年女职工);向同行推荐手机新闻报(湖南 LY 镇的个体户老板);请朋友帮忙视频聊天(湖南 LY 镇医生);帮朋友安装炒股软件(重庆市区的罗姓男居民);表姐夫的同事帮忙杀毒(天津 TH 村的赵姓女居民)。强关系在上述事例中为求助者消减了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努力缺乏、社会支持不足、社会影响不够等方面的贫困程度。出现在本组的弱关系除湖南 LY 镇的网吧老板帮助客户开机的事例之外,其他 7 例均是在本人社会网络范围内不能找到有效的强关系节点,转而寻求电脑、手机或通讯运营商的售后服务。

从七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联情况来看,叠加的数字化贫困类型越多,贫困者寻求社会网络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寻求帮助,也更倾向于强关系。叠加数字化贫困的类型越少,向弱关系寻求帮助的可能性越大。

(3)研究发现三:数字化贫困程度越低,数字化贫困状况叠加越少,数字化贫困者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

与研究发现二中的七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与社会网络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是,在 47 位非数字化贫困者(没有取值为 0 的数字化贫困特征)中,26 位个案通过社会网络寻求帮助,其中 14 位通过强关系获得数字化帮助,12 位通过弱关系获得帮助。尽管样本小,但仍有一定的解释力。寻求强关系节点帮助的这类人群主要是在校学生,其次是年轻父母;利用弱关系节点的人群中,绝大部分面临硬件故障问题,且年龄在中年以上。这也证明,数字化行为主体的年龄与社会网络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从上述个案可以观察到,数字化贫困程度强弱与社会网络的利用水平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

3 社会网络与不同复合数字化贫困现象的关系:微观考察

从更微观、细致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贫困个案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对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别组合而成的复合贫困者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1)研究发现四:以数字化心理和数字化能力为基础贫困状态叠加后的非物质数字化贫困者对强关系的依赖更重。

数字化心理缺失状况下形成的脆弱贫困者与数字化能力不足影响下的数字化文盲在现实中被叠加之后,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联关系得到本研究个案的验证。排除七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和六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没有社会网络支持的个案之后,形成以脆弱与文盲为基础的非物质数字化贫困者,个案样本有 21 个,其中 10 位居民个案中提到的事例涉及了强关系,覆盖到数字化贫困者的妻子、丈夫、儿子、孩子、孙子、邻居的孩子、好朋友等。在这组个案中,受访者均未提到求助弱关系的实例。强关系在消减这一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数字化能力贫困状态和数字化心理贫困状态时有明显的作用。

考虑到数字化心理的高度敏感性和隐私性,以及数字化能力提升的长期性和缓慢速度,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对这类人群消减数字化贫困关键特征的价值超过弱关系。

(2)研究发现五:以数字化社会支持为基础贫困状态的数字化双重或单一贫困者对强关系和弱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

在样本个案中,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单独出现 20 次,8 人通过强关系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主要强关系节点包括长辈,如爸爸、表叔、婶婶等,同学、同事和朋友。6 人通过弱关系获得帮助。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与徒劳无益者叠加后出现 3 位个案,其中 1 位通过儿子查询医药信息,对于改变他对数字化影响不足产生的徒劳无益的感觉有明显作用。从个案数据来看,数字化社会支持缺乏的状况下,数字化贫困者显然不会对社会网络的类型有明显偏好,只要能够为其提供数字化行为方面有效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即可消减其数字化贫困程度。

孤独的贫困与抵触的贫困叠加后形成的双重贫困者却很难获得强关系甚至是弱关系的支持。本研究涉及的 4 位个案都来自农村,其中 3 位是甘肃天祝田野点的受访者,1 位在重庆农村长大,在面临缺乏社会支持和社会规范的约束时,他们呈现出的双重贫困状态属于短期内很难改变的特征,短暂性的、情境式的社会支持不足以消减社会规范带来的被动的抵触惯性。

(3)研究发现六:强关系对以徒劳无益为基础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消减作用明显。

通过文本编码可以发现,以数字化影响不足为基础叠加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可以得到强关系的支持和改变。在强关系支持的 48 个个案中,徒劳无益者特征出现在 17 位受访者身上,显著超过它在弱关系支持的 22 个个案中的出现次数(2 次)。与之对照的是孤独贫困特征,在强关系个案中出现了 21 次,在弱关系个案中出现 8 次,所以可以认为相较于弱关系,强关系对徒劳无益者的价值更明显一些。徒劳无益者之所以

受 ICT 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和社会网络节点看不到 ICT 对实际生活和工作的积极影响,所以难免会出现动力不足、悲观、失望的情绪。强关系作为与贫困者同质性相对较高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认同度更高,使用 ICT 徒劳无益后的情绪更愿意分享给强关系,寻求帮助的可能性因此超过对弱关系的依赖。

(4)研究发现七:弱关系仅在孤独贫困者类型的数字化贫困群体中起到明显作用,其他类型的数字化贫困群体中未见到弱关系的显著影响。

在弱关系有价值的 22 位个案中,有 1 位五类复合数字化贫困者(重庆 YP 镇麻将馆老年男性居民),1 位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1 位徒劳无益者,1 类孤独和抵触叠加的数字化贫困者,6 位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其他 13 位均为非数字化贫困者。考虑到样本的局限性,我们暂不完全考虑数量之间的差异,仅从常识出发理解弱关系的价值,只有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的数字化贫困者才会优先考虑向哪怕是不可靠的外部社会网络如弱关系发出求助申请。弱关系对其他类别数字化贫困的影响作用在本研究中不算明显。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弱关系对数字化贫困者的价值不大。在田野研究中发现,青树教育基金会(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在甘肃天祝投入大量公益资源,作为弱关系,通过天祝一中延伸到诸多农村学生及其家长身边,对于改变个案层面的数字化贫困现象具有明显效果。

除上述研究发现之外,数字化努力也能够得到强关系的影响,在得到社会网络帮助但数字化努力不够的 17 位贫困者中,16 位得到强关系的支持,1 位获得弱关系的支持。尽管还有 33 位显示出数字化努力不足的个案尚未得到任何社会网络的支持,但从已获支持的样本来看,积极影响的可能性大。

从田野研究中能够归纳出,强关系对数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支持、数字化影响的改变作用得到了个案的支持,而弱关系对数字化社会支持的积极影响也

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数字化物质贫困尽管在个案求助实例中出现过,但强关系和弱关系在消减数字化物质实体的缺乏状态时还是临时性的,所以这二者的影响关系没有得到个案的充分印证。数字化社会规范在个案中没有得到印证,也从侧面证明这个要素是最难改变的。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大量田野数据的文本编码,从个案出发,识别出现实社会中八种数字化贫困类别特征的存在形态,不仅是单一形态,更多的时候以复合形态体现在贫困者个体身上,叠加后的形态让数字化贫困现象更加复杂。从数字化贫困的整体和微观两个角度归纳出社会网络对不同数字化贫困类别特征叠加而成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的影响。数字化贫困者叠加的贫困特征越多,社会网络的价值越受到轻视,反之,数字化贫困者身上叠加的特征越少,获得社会网络有效支持的可能性越大。社会网络对数字化赤贫者的价值没有得到验证。在中等程度(两类叠加到五类叠加)的复合数字化贫困者中强关系的积极作用明显。强关系对消减脆弱的数字化贫困者、数字文盲、懒惰的数字化贫困

者、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和徒劳无益者的贫困者有价值。弱关系则仅对孤独的数字化贫困者的价值明显一些,对其他贫困特征的消减作用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由社会规范导致的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与社会网络的关系在研究中没有得到有效验证,不代表现实中不可行,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设计与实践探索。

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为未来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数字化扶贫政策有直接参考意义。第一,贫困程度越高,数字化贫困特征叠加越多,政策设计与实践中越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不足以独自明显地改变数字赤贫者的贫困状态。第二,在消减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心理、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支持、数字化影响等要素不足或程度不足的政策设计中,要充分考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价值,重视社会网络强关系的培育,让数字化贫困者在适当借助外力的基础上,更多依赖其社会网络和自身造血功能,完成数字化视野中的永续脱贫。第三,在缺乏数字化社会支持的人群(孤独的贫困者)中,在强化强联系的同时,还要重视弱联系带来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第四,抵触的数字化贫困者是否需要扶贫或者脱贫,需谨慎对待。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17-08-15]. 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xbzg/hlwtjbg/201708/t20170803_69444.htm.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he 40th China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R/OL]. [2017-08-15]. http://www.cnnic.net.cn/hlwfyj/hlwxbzg/hlwtjbg/201708/t20170803_69444.htm.)
- [2] 闫慧, 闫希敏. 农民数字化贫困自我归因分析及启示:来自皖甘津的田野调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5): 68-81. (Yan Hui, Yan Ximin. Self-attribution of digital poverty by rural resid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field studies in Anhui, Gansu and Tianjin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5): 68-81)
- [3] 闫慧. 农民数字化贫困的结构性成因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2): 24-39. (Yan Hui. Structural origins of digit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2): 24-39.)
- [4] Van Dijk J A G M.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M]. Thousand Oaks: Sage, 2005: 9-14.
- [5] Dimaggio P, Hargittai E, Celeste C, et al. Digital inequality: 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M]//

- Neckerman K M.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4: 355-400.
- [6] Hargittai 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M/OL]// Derik C J. New economy handbook.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3 [2009-05-12]. <http://www.eszter.com/papers/c04-digitaldivide.html>.
- [7] Kvasny L 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digital inequality[C]//Banker R D, Chang H, Kao Y C.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MCIS 2002), Dallas, August 9-11, 2002. Dalla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1798-1805.
- [8] Stroope B E. The impertinent Internet: gendered digital inequalities among teens[D]. New Orleans: Tulane University, 2008: 101.
- [9] Alvarez A S. Behavior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digital inequality[J]. IT & Society, 2003(5): 97-140.
- [10] Hargittai E. The digital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M]//Grusky D B.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Westview Press, 2008: 936-944.
- [11] Cartier C, Castells M, Qiu J L.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2): 9-34.
- [12] Levinson N S, Hervy A C. Digital inequaliti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ross-national alliances[C]//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2-5, 2004. Washington, DC: APSA, 1-22.
- [13] Ho C C, Tseng S F. From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equality: the glob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2006(3): 215.
- [14] 王明, 闫慧. 农村居民跨越偶现式数字鸿沟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价值: 天津静海田野调查报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5): 39-49. (Wang Ming, Yan Hui.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on bridging accidental digital divide among rural residents: a field report from Jinghai County, Tianji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5): 39-49.)
- [15] 闫慧, 洪萍璋. 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数字化脱贫的影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里耶镇的田野报告[J]. 情报资料工作, 2014(3), 89-94. (Yan Hui, Hong Pingzhang. Impa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dig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of ethnic rural residents: field study on Liye, Tujia-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Xiangxi[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4(3): 89-94.)
- [16] Williams K. Social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socially excluded communities: a study of community groups in Manchester, England[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 125-152.
- [17] 匡立波, 黄渊基.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弱关系”与脱贫路径创新研究: 基于湘西北“微善风”民间助学慈善组织的考察[J]. 学习与探索, 2017(3): 48-56. (Kuang Libo, Huang Yuanji. Weak ties of social capit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and the innovative path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 study of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Micro Charity” in northwest Hunan province[J]. Study & Exploration, 2017(3): 48-56.)
- [18]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6): 1360-1380.
- [19]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2-95.
- [20] Kavanaugh A. The impact of computer networking on community: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C/OL]//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Research Conference, September 27-29, 1999[2017-08-15]. <http://www.bev.net/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TPRC.UserStudy.Kavanaugh.pdf>.

闫 慧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 2017-12-05)